

安妮
著

安妮
投资
生涯
路

——改写人生



安妮 著

安妮投资生涯路

——
改写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妮投资生涯路：改写人生/安妮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3-1652-8

I. 安… II. 安…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084 号

安妮投资生涯路——改写人生

作者：安 妮

责任编辑：袁 敏

装帧设计：李颖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6 千

印张：9

插页：4

印数：40001-50000

版次：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5 次印刷

ISBN 7-5063-1652-8/I·1640

定价：17.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16岁的安妮



▼ 26岁的安妮

人生
轨迹

▲ 46岁的安妮



▲ 36岁的安妮





▲ 当插队知青的安妮



▲ 在电视台当编辑的安妮

▼ 刚做母亲的安妮



平凡
女人



▲ 在工厂当会计的安妮



► 谈恋爱的安妮



▼ 群英荟萃

▲ 安妮公司工作人员



重
写
人
生

▼ 安妮投资专业研讨会



▲ 带领高级会员参观
走访上市公司



► 安妮演讲



▼ 参观美国上市公司

▲ 安妮演讲场内一角



▲ 向广东美雅上市公司赠书

重
写
人
生



目 录

引言：人生的定位	1
一 我的第一桶金	10
二 终于成了“有产阶级”	20
三 亏损 50 %	29
四 抽签表的故事	37
五 从希望到失望	48
六 首次代人操盘	58
七 牛市大逃亡	68
八 向 B 股、港股进军	78
九 被资产重组的宝安农民	86
十 漫漫熊市从头越	97
十一 四大利好强刺激	108
十二 无股一身轻	119
十三 操作室的诞生	129

十四	火爆的国债期货	138
十五	期货市场大练兵	147
十六	咨询公司新开张	158
十七	函授与面授	166
十八	牛市的伟力	173
十九	发展，发展，再发展	182
二十	“五朵金花”	190
二十一	来自北京的声音	198
二十二	高位套牢 低位换股	206
二十三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213
二十四	马背上的“牛仔”	223
二十五	九七香港回归	231
二十六	机构操盘研讨会	240
二十七	我和非非	247
二十八	安妮旗下群英荟萃	259
二十九	资产重组的先锋	268
三十	从证券市场到投资管理	275
	后 记	283

引言：人生的定位

在人生的历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找准自己的定位很不容易，但又十分重要。

定位是人生的开始，也是人生的选择。选对了，事半功倍；选错了，不光一事无成，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有些人并非能力不强、社会关系不佳或工作不认真，恰恰相反，他们本来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获得灿烂的成功，但只因为选错了方向，结果越努力输得越惨。

改革开放以前，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很难自由地去选择某个职业、某种行业，一切都是“服从分配听指挥”，捧上了铁饭碗就等于定了终身，没有改变的余地。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被确定为“实践”，而非某某人的指示。一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解放

运动轰轰烈烈地席卷中国大地。这时人们才开始逐渐地对自己的人生定位进行反思，有一部分人首先摔掉了“铁饭碗”，罢吃皇粮，走上了自谋生路的历程。我就是在此历史大潮下背井离乡，开始走上“改写人生”的坎坷之路。

我出身在江苏太湖之滨一个医生的家庭，爷爷和父亲都是基督教徒，均由教会培育他们上学和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一次次被批斗，上班下班挂着大铁牌子从医院走到家中，铁牌上赫然写着：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并用红墨水打上叉叉，路人避之不及。铁牌上的粗铅丝经常深深地陷入他的脖颈，留下深深的印痕。一个夏日的中午，乘路上没有行人，我忍不住踮起脚把父亲脖子上的大铁牌取下来，扔在地上，吓得我父亲连连摇手，马上弯腰拾起重新挂在脖子上，继续埋头弯腰在路上行走。我一边尾随一边发恨，又跺脚又抹泪，心里觉得父亲真像一头忍辱负重戴着轭把的老黄牛，为什么不知道反抗！！哪怕是悄悄的反抗。

回到家中，父亲把我拉到身旁，眼眶里掉下两颗黄豆大的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容，他哭着说：不挂铁牌，他们要打我……

这个“他们”当然是指工宣队，工宣队不光监管我的父亲，还监管我的生活，要我定期到他们那里汇报思想，并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父母亲划清界限。一连串的批斗和劳动改造最终将我父亲迫害致死，

临死前他甚至不敢转院出去治疗。他颤抖着说：转院治疗他们又会批斗我的……黑色的恐怖一直笼罩到他生命的终结。父亲的老实、忍耐、胆小在我心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我这一辈子决不能像父亲那样活得委曲求全，死得不明不白。我要堂堂正正挺直腰板做人！

我上的中学前身也是教会学校，取名“辅仁学校”，解放后改名为无锡市二中，在江南是极为有名的，曾培养出一批批文化和经济界名人。原中宣部部长王忍之，文化学者钱钟书，科学家钱钟韩，经济学家薛宝鼎，音乐学家杨荫柳等等均为该校毕业生。

我的先生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彼此跨越好几个年级，他的年龄比我大五岁，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我俩在插队落户时就被彼此吸引。1974年他在苏北插队时调至县委宣传部工作，后被错打成“五·一六分子”（一年后给予平反）。当时他只想凭借文学这一工具抒发自己孤愤的情怀和强烈的人生感悟，以便找到宣泄和慰藉。

1971年冬季，他风尘仆仆从无锡绕道东台找到我插队的苏北东台县梁垛大队（该大队离县城十八公里），想要我对他的新作提出一些批评修改意见。当时我已写成了一部长篇纪事长诗《一位女知青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位姓钱的女编辑找我联络，说准备出书，大家互相正好切磋探讨，那时懂文学、搞文学的同道者实在太少了！

我记得那天我正在大队参加社员大会，广播喇叭突然叫

喊：四队的女知青请立即回家，有人找！当时在大队部开会的几十名知青眼光刷地一下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人找，准是我的号。我未插队前就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下乡前家里整天一批又一批的客人，有年轻人，也有成年人，甚至还有老年人，他们都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结识的。在悠悠岁月中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学校里，永远有一群男同学对我表示特殊的好感，下乡后，他们甚至还一个个跑来看我。这次来的会是谁呢？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急跳。

走到知青组木窗泥墙的茅屋前，我才看到姐姐从厨房里跑出来向我招手，在她身后站着我现在的先生，（那时还只能叫笔友），他穿着一身的确良卡其中山装笑眯眯地望着我。

他是一位沉默、内向的男生，当时已有二十五岁，而我正好二十芳龄。我们所有的接触都非常严肃，正经，只谈文学，不说其它。即便以后谈起了恋爱，我们也从来没有手挽手逛过马路，肩并肩看过电影，所有的谈情说爱几乎都是在文学的世界里遨游，并且常常夹杂着清苦的中药味，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连爱情都变得那样“清真”。

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了一年，那时他已从苏北调到江苏南京的《江苏文艺》编辑部，任诗歌散文编辑。这时候他的生活面临一次抉择，要么在南京定居，那儿有他旧时的女友，要么调到无锡，与我成家。

不久，他的处女作诗歌《春风常驻十里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那时我父亲还没逝世，他首先发现了，把报纸

拿回来给我看，并感叹道：这个人若不能做我的女婿，我也情愿认他作儿子。我知道父母都很喜欢他，但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婚嫁，觉得自己实在太年轻。父亲也常对我说：一个女孩子应该先立业后成家，有了工作，有了安身立命的依靠才能谈恋爱。这句话我是充分接受的，所以我对他的等待视而不见，每次当他问我：我留南京还是调无锡？我总是没好气地冲他嚷：这关我什么事！平心而论，如果从他的前途考虑，我知道，他应该留南京，因为在那儿他可以进行专业创作，如果回无锡也许只能当个工人罢了。而他是那样醉心于文学，有时可以一口气写十几个小时，一连创作十天半个月。

在我没有表态之前，他的调动迟迟未办，他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我不忍再看他拖下去，终于寄了一封回绝他的信。他收到信后连日呕吐大病一场，后来从南京带着几箱豆油、几筐香肠和皮蛋（当时都是最紧张的需凭票供应的商品）送到我家，让我好好休养，并说：我以后不能来看你了，你要自己保重。说完，脸色蜡黄地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大哭一场。他的调动迟迟未办，我想我在人生路上没有知己了，至少在文学创作上没有笔友了。恰恰这时我父亲开始病重，三个月急救无效，一命归天。那时的我才二十二岁，因为照看父亲同时染上肝炎，虽然病退回城，但已一病不起。我觉得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如此灰暗和狭窄，除了治病只有吃药，还有什么作为可言？许多医生都对我说：小姑娘，认命吧，不要再想这想那的了。

这时候，他又悄然而至，再也不向我提求亲之事，只是每天来给我捣中药、煲中药，把中药递到我手中前总要亲口尝一下是否还烫嘴，默默地伺候我。我多半是自顾自睡觉，并不睬他，而他也就默不做声地在一旁一陪就是一天，晚上才赶去开夜车写稿。

有一次我忍不住了，问他：你调动的事办得如何？

他点点头，说：正在办，调无锡。

我一听，全明白了，他在执意等我。“你需要有人照顾”，他补充了一句。看来，生米煮成了熟饭，我已无法再拒绝。

为了调回无锡，他的档案寄了四次退回四次，但最后终于办成了。他也果真到无锡的一家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配料工人。当时，编辑部的同仁都为他惋惜，同时又热烈祝福我们两位文学青年永结同好。

我们是在 1978 年结婚的，经过四年的治疗我的病终于痊愈，吃了四年的中药，中药渣如果凑在一起可以装一船，所以说我们的恋爱是在中药的苦味中浸泡成长的。

结婚后，我开始去一家工厂做会计，从零售会计、记账会计一直做到成本会计。由于不满足于企业枯燥无味的业务，我又参加市内广播电视局的招聘，以优异的成绩在三千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电视台文艺部的一名编辑。当时考进广播电视局的有三十多人，而录取在文艺部的仅我一个，插队落户时搞文艺创作的经历这次帮了大忙。其时，我已出版过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及评论多种，并成为江苏省作

家协会会员，全国散文协会会员。

记者、编辑的职业似乎十分风光，前途看起来一帆风顺，其实不然。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激烈，我走到哪里都容易成为“争议人物”。其时我先生已从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准备去海南创业办公司。

临走前，他与我彻夜讨论，去还是不去？当时，我坚决支持他去。如果不去，留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或其它文化部门当个干事之类的，其前途是可以估想的，但如果下海办公司前景无法估量，不管是好还是坏，正是这个未知数，才让我怦然心动。

我和我先生的个性中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喜欢不确定性，如果人生都在意料之中，都被计算好，什么时候发达，什么时候倒霉，什么时候老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毅然一致选择了风险性极大的目标——下海！文人下海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但成功的例子却不多。

先生下海之后，我的灵魂就像俄国的诗人莱蒙托夫在短诗《帆》里面所写的：“它不安地祈祷着什么，又不安地等待着什么……”我虽然在电视台干得并不赖，已经拍了几个电视剧，当上了电视剧导演，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等等，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却无法平静地安于现状，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已不具备新的挑战意义，因为电视台的一切业务都是集体创作和合作的结晶，个人的努力更多地依赖于团体的协助，我觉得自己还有精力可以干一番更宏伟的事业。于是，调动工作至北京

中华文学基金会，并接受委托到广州开辟办事处。

原本，我可以在先生开办的公司内任职，那时他的公司风风火火，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但我意识到夫妇俩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实在是犯大忌的，互相关系不好处理，员工们也会有种种想法。而且，在广东沿海发生的许多家庭纠纷都使我明白，对一个女人而言，最有风险的投资便是男人！女人如果不投资在自己的能力、学识、人际关系诸方面，把所有的希望和回报都押在丈夫身上，她最后得到的不光是虚无还有失败。中国的女人都喜欢为丈夫，为孩子全身心地付出。我以前也曾经这么熬过来，结婚后支持丈夫继续创作，自己怀孕养孩子停止了文学上的探索，生孩子后又支持丈夫去北京读书，独自承担家务，抚养孩子，靠自学考试才得到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证书，但这种付出和回报其实是不相等的。

“因为你没有自己，所以也只能让人忘记你！”

在我离开电视台时，一位报社的女友曾经这么告诫我，而到了海南特区的所见所闻更使我相信选择自己，投资自己，才是最明智的。在现代社会中女性以自尊、自爱、自立才能赢得最稳健的回报。既然已南下，我想就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经营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编织自己新的人生。

主意打定之后，我要求中华文学基金会将我的工作单独安排。1990年我被任命为广州办事处负责人。

在广州期间，我遇到了中国的第一批“股评家”，那时他们都是央行的官员，在东京证券交易所考察后来广州授课。我